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社会主义思潮与 中国文化的相遇

蒋锐 鲁法芹 著

当代
社会主义
研究文存

The Encounter of
Socialist Thoughts and
Chinese Culture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社会主义思潮与 中国文化的相遇

蒋锐 鲁法芹 著

当代
社会主义
研究文存

The Encounter of
Socialist Thoughts and
Chinese Culture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主义思潮与中国文化的相遇/蒋锐, 鲁法芹
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209-09895-3

I. ①社… II. ①蒋…②鲁… III. ①社会主义—政治
思想史—中国—近代 IV. ①D0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81953号

社会主义思潮与中国文化的相遇

蒋锐 鲁法芹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开 (169mm × 239mm)

印 张 16.5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

ISBN 978-7-209-09895-3

定 价 4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前 言

恩格斯说过：“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1〕}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潮还是运动，社会主义在中国都不是近代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自发产物，也不是中国传统大同理想的逻辑延伸，而是源于欧美、经多种渠道传入中国的“舶来品”。然而，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种外来的思想理论学说，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都必须和它已有的思想文化传统实现有机“嫁接”，否则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思潮也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好，要在中国获得传播和发展，首先必须实现其自身的本土化、民族化、中国化。近代以来，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在中国的兴衰沉浮，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和社会理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很多理念都可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找到其基因，正如王淄尘在上世纪30年代所言：“社会主义之一名词，虽产生在近三百年，但社会主义之思想，则自人类成立社会，即已有之。”^{〔2〕}在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主张中，充满了安民、抚民、养民的思想以及大同、尚同、太平的社会理想，例如孔子所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均无贫”“老安少怀”，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页。

〔2〕王淄尘：《儒家社会主义》，载《学术世界》第2卷第1期。

老子的“小国寡民”社会理想，墨家的“尚同”理想，孟子所主张的“仁政”与“井田制”，农家所主张的“君民并耕”思想，《吕氏春秋》所倡导的“天下为公”“选贤任能”思想等。这些思想经过漫长的积淀和发展，逐渐汇成了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学说，其大同、均平的特色非常突出，就像《礼记·礼运篇》中所描绘的那样：“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大同、均平理想，经过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知识分子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核心组成部分。例如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中所描绘的人人均财力、同苦乐、天下一家的理想太平世界，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所描绘的无君无臣、无富无贵的社会理想，陶渊明所描绘的无压迫剥削、共同劳动、人人安居乐业的“世外桃源”，张载在《经学理窟》中关于井田制的新设计，李觏《平土书》和康与之《昨梦录》中所设计的“计口授田”的土地制度，以及太平天国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等，都凸显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这种大同、均平的社会理想。这种理想不仅表现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也具体体现在现实生活实践中，例如历代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中所提出的各种政治经济主张，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进入近代以后，康有为在汲取古今中外关于未来社会理想之精华的基础上，完成了《大同书》这一巨著，把西方社会主义理解为“合群均产之说”，认为这社会主义远不及“远近大小若一”的中国大同理想，只不过是“大同之先声”^{〔1〕}，从而将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推向了一个更高层次。孙中山作为中国传统大同理想的又一继承者，也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三民主义学说，其中的民生主义已具有鲜明的“现代社会主义”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欧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如果不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这些近似元素相结合，是根本不可能的。

根据现有史料，汉语中的“社会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896年11月25日

〔1〕 康有为：《大同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1、264页。

出版的《时务报》第12册,在其《东文报译》栏目刊载了日本人古城贞吉所翻译的《硕儒诂音》一文,其中称英国人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为“近世社会主义之泰山北斗”,称社会主义乃“一学派之名”。1898年,梁启超首次使用了“国家社会主义”一词,认为该学说乃是“调剂社会贫富不均的不二法门”^[1]。1903年10月《浙江潮》第8期刊载的署名“大我”的《新社会之理论》一文,第一次简要介绍了“共产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即无政府主义)思潮学说^[2]。在1906年发表的署名“漱铁和尚”的《贫富革命》一文中,第一次将平等主义、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主义等同起来,认为“平等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亦即大同主义也”^[3]。然而,真正把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大同理想联系在一起并加以系统解说的,则是1907年6月创刊于巴黎的《新世纪》^[4]。在1907年7月发表于该刊第6期上一篇署名为“民”的题为《伸论民族、民权、社会三主义之异同再答来书论“新世纪”发刊之趣意》的文章中,作者把社会主义(实为无政府主义)等同于“求全世界人类之幸福”的中国儒家大同主义,称社会主义主张“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以冀大同;无贫富,无贵贱,以冀平等;无政府,无法律,无纲常,以冀自由”^[5]。此后,该刊又相继刊发了《〈礼运〉大同释义》《人类原始说》《大同释疑》《大同心理》《驳时报〈论中国今日不能提倡共产主义〉》《巴黎之大同革命》等文,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对无政府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详细解读。

1908年,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等人在日本创办《衡报》,在其发刊词中便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作为开篇。在《衡报》第2号《论共产制易行于中国》一文中,刘师培更是把《礼记·礼运篇》中那段对“大同”的描绘视为中国“易行共产之确据”^[6]。民国初年,孙中山也曾说要“使先贤大同世界之想象实现于二十世纪”^[7],并把作为“社会主义之上乘”的共产主义视同“大同之

[1] 梁启超:《佳人奇遇》,载《梁启超全集》第10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5595页。

[2] 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513—515页。

[3] 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553—554页。

[4] 《新世纪》周刊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无政府主义刊物之一,由李石曾、张静江等于1907年6月22日在巴黎创办,1910年5月2日停刊。该刊的宗旨是反对宗教主义、家族主义、私有主义、祖国主义、军备主义“五大主义”,鼓吹建立“无政府共产主义”。

[5] 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008页。

[6] 参见李妙根编选:《刘师培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第249、254—255页。

[7]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1页。

世”^[1]。1919年，毛泽东提出了他关于“新村”的设想：“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2]这种设想，其实也不过是中国传统大同理想社会的一种翻版。1920年，梁启超将《礼记·礼运篇》中关于大同的那段话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并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康有为的大同学说“与今世所谓世界主义、社会主义者多合符契”，只是“陈义过高”^[3]。

事实上，把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均平”思想、“大同”理想相提并论，是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时期的一种普遍现象，无论是晚清政府外交人员还是来华人士或传教士，无论是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或无政府主义派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解读大多没有脱离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背景，而是将二者联系起来甚至等同起来，赋予社会主义以各种中国文化元素，正如时人所言：“《易》《书》《诗》之记载，孔孟之绪言，周秦诸子之著作，其吻合社会主义者，随在而是。”^[4]“欧洲所谓社会主义者，其倡导在近百余年间，我国则孔、墨、孟、荀、商、韩，以至许行、白圭之徒，其所列论，殆无一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5]当时有人甚至还专门撰写了题为《西汉社会主义学发达考》的文章，来论证社会主义不仅在中国古已有之，而且还早已付诸了实践^[6]。直至民国时期，这一现象在当时的思想和知识界还普遍存在，例如1920年《工学》第4期发表的《中国古代社会主义的思潮》、1923年《爱国报》第11期发表的《孔道之社会主义》、1929年《协大新潮》第6期发表的《中国古代的几个社会主义思想家》、1936年《学术世界》发表的《儒家社会主义》、1938年《近代杂志》第1卷第3期发表的《儒家学说在社会主义思想方面的贡献》等等。可以说，自西方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以来，它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一些固有元素的联系与融合就从来没有间断过。因此，本课题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系统总结自洋务运动至

[1] 参见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7、364页。

[2]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18页。

[3] 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21—123页。

[4] 江亢虎：《社会主义研究会开会宣言》，载《社会星》第2期，1911年8月。

[5]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载《梁启超全集》第6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605页。

[6] 参见万仕国辑校：《刘申叔遗书补遗》（上），广陵书社2008年版，第733—742页。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学说在中国传播发展过程中，是如何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相关元素进行结合的，以及在这方面的经验得失。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学说成为当时中国众多社会主义思潮中新的一员，但又是与众不同的一员。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思想上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在理论上的科学性和完备性，在实践上的人民性和彻底性，使它很快从当时众多的社会主义思潮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仁人志士和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武器，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翻身求解放的理论指南，获得迅速传播和发展。当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同样也是一种外来的思想理论，它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同样也必须是一个不断本土化、民族化、中国化的过程，亦即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有关元素相结合的过程，否则它便不可能为广大中国人民所理解、所接受、所喜闻乐见，从而也不可能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对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过失败的教训。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的不断成熟，随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共领导集体的形成，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及其不断深化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才真正开始找到一条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的正确道路，才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中国化和民族化，从而指导中国革命走向了最终胜利。因此，本课题研究的目标之二，就是系统总结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在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如何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相关元素进行结合的，以及在这方面的经验得失。

为实现上述两个研究目标，本课题主要围绕以下八个方面展开：（1）早期译介作品中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解读，着重探讨洋务运动时期即社会主义思潮与中国文化初遇时期，人们对西方工人运动、工人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理论学说的中国文化解读，特别是晚清出洋国人和来华西人的一些观点和见解。（2）改良派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解读，着重探讨戊戌变法运动前后，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变法派人士对欧美社会主义思潮的中国文化解读，特别是康有为的“大同之先声”说及其《大同书》对中国传统大同思想的超越。（3）革命派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解读，着重探讨辛亥革命前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解读，特别是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

思想及其“平均地权”“大实业国有”两大经济纲领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关系。(4) 无政府主义派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解读,着重探讨20世纪初期以刘师培为代表的“天义派”和以李石曾等为代表的“新世纪派”对无政府主义的中国文化解读。(5) 民初各流派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解读,着重探讨20世纪早期以江亢虎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党、以师复为代表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派、以王淄尘等为代表的“新世界派”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中国文化解读,以及各流派之间围绕有关问题的论争。(6) 五四时期各流派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解读,着重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和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解读。(7)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解读,着重探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在完成世界观转变过程中,以及在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解读,特别是他们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和取得的初步成果。(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文化意蕴,着重探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学术中国化”“新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方面的所进行的不懈努力,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文化意蕴,以及毛泽东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的卓越贡献。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早期译介作品中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解读 / 1

一、对欧美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组织的解读 / 1

(一) 关于巴黎公社 / 1

(二) 关于欧美工人运动 / 4

(三) 关于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 / 6

二、对社会主义理论学说的解读 / 11

(一) 社会主义“无非坎颠倒国是，令高低贫富归于一式” / 12

(二) 社会主义乃“均富之说” / 13

(三) 社会主义乃“平分产业” / 15

(四) 社会主义乃“工人集股成本通力合作” / 17

(五) 社会主义乃“大同之世” / 18

三、评析：社会主义思潮与中国文化的初遇 / 19

第二章 改良派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解读 / 23

一、严复的“均贫富之党”说 / 24

二、康有为的“大同之先声”说 / 27

(一) 康有为的治学理路 / 27

(二) “行大同救天下”的社会理想 / 29

(三)《大同书》对传统大同思想的超越 / 31

三、梁启超的“原是我所固有”说 / 34

(一)以“保育主义复骤昌”为主的经济思想 / 34

(二)托拉斯乃“调和资本家与劳力者之争阂一法门也” / 37

(三)社会主义“即以救私人之过富过贫为目的者也” / 39

(四)社会主义与“中国历史上性质颇有奇异之契合也” / 42

四、吴仲遥的“广狭义社会主义”说 / 44

第三章 革命派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解读 / 49

一、孙中山：社会主义的目的在“养民” / 49

(一)关于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概念 / 50

(二)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 / 51

(三)社会主义“原来是要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 / 54

(四)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认识 / 55

(五)大同主义是“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思想” / 57

(六)共产主义乃“社会主义之上乘” / 59

二、朱执信：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社会全体之幸福也” / 61

(一)社会革命源于“社会经济组织之不完全” / 61

(二)社会主义运动“以阶级斗争为本据” / 63

(三)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 / 65

三、其他革命派人士对社会主义的解读 / 66

(一)廖仲恺：社会主义是世界革命“三大主义”之一 / 66

(二)胡汉民：社会主义“以平经济的阶级为主” / 69

(三)宋教仁：主张“师社会主义之意” / 72

(四)冯自由：社会主义的目的在“救正贫富不均，而图最大多数之幸福” / 74

(五)戴季陶：社会主义“即人道主义之别名也” / 77

四、民生主义“两大经济纲领”与中国古代传统 / 81

(一)“平均地权”与中国古代“井田制” / 81

(二)“大实业国有”与中国古代“工商国有” / 83

第四章 无政府主义派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解读 / 85

- 一、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早期译介 / 86
 - (一) 梁启超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译介 / 86
 - (二) 译自日本有关著述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 88
 - (三) 革命派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译介 / 91
- 二、“天义派”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解读 / 95
 - (一) 对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说 / 96
 - (二) 无政府主义“当以平等为归” / 98
 - (三) 对科学社会主义若干理论观点的解读 / 101
- 三、“新世纪派”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解读 / 103
 - (一) 认为“革命即进化” / 104
 - (二) 无政府主义“义广理全，至公无私” / 106
 - (三) “无政府与共产主义为二而一” / 108
- 四、无政府主义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 / 110
 - (一) “天义派”：无政府主义之实行以“中国为最易” / 111
 - (二) “新世纪派”：演绎传统“大同”理想 / 114

第五章 民初各流派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解读 / 117

- 一、江亢虎：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大同主义” / 117
 - (一) 江亢虎“三无主义”学说的思想渊源 / 118
 - (二) 社会主义思想“凡含灵负秀者”，中国“无不有之” / 120
 - (三) 中国社会党的社会主义主张评析 / 122
- 二、师复：“无政府共产大同”社会 / 124
 - (一) 师复接受无政府主义的文化心理基础 / 125
 - (二) 析师复对社会主义“真谛”的解读 / 128
 - (三)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自有甚精之点” / 132
- 三、“新世界派”的社会主义观 / 133
 - (一) “由国家主义进而为世界主义” / 134
 - (二) 《礼运》大同之说即“社会主义所实行时之现象” / 135
 - (三) 施仁荣《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评析 / 138

四、关于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的论争 / 141

(一) 关于社会主义流派划分的论争 / 142

(二) 煮尘与杜亚泉、钱智修和欧阳溥存的论争 / 144

第六章 五四时期各流派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解读 / 151

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对社会主义的解读 / 152

(一) 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 152

(二) 马克思的阶级观点与社会主义 / 155

(三) 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实行社会革命 / 157

(四) 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是为了“服务于三民主义的革命方略”
/ 159

二、资产阶级改良派对社会主义的解读 / 161

(一) 对待苏俄十月革命的矛盾心理 / 161

(二)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解读 / 162

(三) 社会改造之主张 / 166

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解读 / 167

(一) 合作主义者：“不谈社会主义而社会革命已奏凯旋” / 168

(二) 新村主义者：“道德优先” / 170

(三) 泛劳动主义者：“不以暴力抗恶” / 174

(四) 工读主义者：“平和的经济革命” / 176

(五) 无政府主义者：“直接行动” / 178

第七章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解读 / 181

一、由激进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 / 181

(一) Democracy 译名的新内涵 / 182

(二) “问题”与“主义”之争 / 184

(三) “官逼民反”还是阶级斗争? / 187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观 / 190

(一) 马克思主义“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 / 190

(二) 借传统文化元素阐发社会主义 / 192

(三) 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 / 194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 / 196

(一) 共产主义乃是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 / 197

(二) 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精神” / 198

(三) “完全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成果 / 199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文化意蕴 / 203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及其文化意蕴 / 203

(一) 以马克思主义新哲学引领时代潮流 / 204

(二)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到“学术中国化” / 207

(三) 新启蒙运动就是要“打开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之门” / 210

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文化解读 / 213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争 / 213

(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哲学论证 / 217

(三) 关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途径的探讨 / 220

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贡献 / 222

(一) 从“先中后西”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 223

(二)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 / 225

(三) 新民主主义文化: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 / 230

参考文献 / 236

后 记 / 250

第一章 | 早期译介作品中对社会主义的 中国文化解读

据现有史料，有关西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零星信息传入中国，始自19世纪70年代，即所谓的“同治中兴”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清政府开始兴办洋务，欲求自强之道。洋务运动在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最早开启了一道接触西方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的窗口”^{〔1〕}，从此中国人才开始对西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有所了解。这些信息的传入途径主要有二：一是由出使、驻外人员以日记、“述奇”等方式进行的记载，二是来华欧美人士尤其是传教士通过报纸杂志等进行的介绍。当然，在这些作品中还谈不上对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至多只是一些猎奇性的零星传递。在此过程中，观察者或传递者有意无意地对西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中国化”的理解，或者说中国文化解读。

一、对欧美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组织的解读

（一）关于巴黎公社

有学者研究发现：“中国最先报导巴黎公社斗争的，是香港的《华字日报》

〔1〕 皮明庥：《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觅踪》，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中外新报》等报纸。……普法战争爆发后，刚从欧洲游历归来的王韬与张芝轩、何十洲及陈霭廷等，‘午夜一灯，迅笔瞑写’，译撰了大批报道，交《华字日报》等报发表。1871年，王韬将这些报道汇集起来，补充以其他资料，编成《普法战纪》14卷，刊刻发行，使读者面从香港、广州一隅扩大到了内地。”^{〔1〕}也有学者考证后发现：“晚清时期编写的法国史著作，首先应推王韬的《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这两部著作都对巴黎公社作了论述，前者简略，后者较为详尽。从内容来看，这些论述跟《中国教会新报》的记载如出一辙，有些地方连行文也雷同。看来，《中国教会新报》中的一些报导就是王韬根据外电撰写的，在他编书的时候，便把这些现成的资料用上了。”^{〔2〕}因此，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极有可能是从《中国教会新报》或王韬的《普法战纪》《法国志略》中，最早对巴黎公社运动获得零星了解的。作为晚清时期研究法国史的代表人物，王韬（1828—1897）关于巴黎公社的观点很具代表性，所以我们在此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他对该事件的解读。

自1871年4月22日至9月9日，《中国教会新报》接连报导了有关巴黎起义的消息，称巴黎起义者为“乱党”“乱民”“贼兵”“贼党”，认为起义原因是“国乱无君”“乱党纷起”：“今法王之蒙尘也，国人遂因乱废王，自称民主……而法京之乱党由是纷起矣。其所谓乱党者，即京师内外之护勇与居民也。始当爹亚（现译作梯也尔）公举之时，京中兵民请于爹亚曰，继自今，于京师内外，画地分疆，各自治理，彼此毋相统辖，庶几皆得以自主。爹亚毅然不可，曰，如此则肇离散之端，而事权不归于—，将来争竞繁兴，其祸伊于何底。乱党见其不可，遂作难。”^{〔3〕}在《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中，王韬对巴黎公社起因的解释与此大同小异，但对起义过程的描述则更为详细，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普法战纪》卷十二中，王韬认为，巴黎公社是由“乱党”“乱民”经“公举”而产生的一个地方绝对自治机关，它有权确定和分配捐税，并建立了独立的政权机关和武装力量。他谈道：当梯也尔卖国投敌并与普鲁士签订和约之时，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加里波的“振臂一呼，乱者四应，从之者十余万。各村乱民，无不斩木揭竿，蠢然竞起，弹指之间，其乱已成”；3月18日起义成功

〔1〕 姜义华：《现代性：中国重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0页。

〔2〕 陈叔平：《巴黎公社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3〕 转引自朱庭光：《巴黎公社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09—610页。

后，起义者便“传檄远近，示期于三月二十二日公举人员”；3月28日公社建立后，遂发布宣言，称“兹已公立朝廷，名曰保民而卫国。凡属苍黎，时紫宵吁，此心所发，薄海咸知”；继而，“法京各乡间，欲行保甲，例各自不相辖，赋税则由自征，徭役则由自供，兵勇则由自出，上之人一概毋得钤制之”，且将“所有产业一概充公”^{〔1〕}。对照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关于巴黎公社运动的论述^{〔2〕}，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王韬不仅歪曲了巴黎工人阶级举行武装起义的真相，甚至对“巴黎公社”这个名称也毫无所知，更何谈理解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正如他在评价巴黎公社时所说：“推原其致乱之由，则皆因自主二字害之也。方法国廷臣之转为自主之国也，民间嚣然，皆以为自此可得自由，不复归统辖，受征徭，从役使，画疆自理，各无相制。爹亚以为不可，于是衔之切齿，揭竿竞起。明知势不能敌，法京断不可守，但愿与城偕亡。其定意将一城之繁华，尽付之灰烬，然后其心乃快。是以一炬所经，遽成焦土……呜呼！非自主之一念误之哉！”^{〔3〕}由此可见他对巴黎工人阶级起义之误解与憎恨。

除《中国教会新报》和《普法战纪》外，中国早期关于巴黎公社的其他记述主要散见于一些历史书籍，如1879年上海申报馆刊印的《万国史记》一书，将巴黎起义者称作“共和党”。在叙述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投降时，《万国史记》说：“共和党多列其中，不悦于和，以为屈辱国威之甚也，煽动巴斯工丁雇夫等，护国兵亦多应之者”；继而“共和党”在巴黎发动起义，起义成功，便“树赤帜于府厅”，令各区“推举激徒，名之曰府会员”，并组织群众抵抗政府军^{〔4〕}。该书还叙述了起义失败后“共和党”遭政府镇压的大致过程，并称起义群众为“乱党”“暴徒”之类，其基本看法与王韬无异。

再如，1903年由商务印书馆编译的《法兰西史》一书，在“国会复立共和宪法记”一节中，对巴黎公社起义的评价是：“当普迫法讲和时，巴黎城中，民乱蜂起，布满府厅。权中央政府者，不得已退至勿而洒衣而（现译作凡尔赛）。后反乱败，法乃渐兴。”^{〔5〕}在该书序言中，作者主要针对巴黎公社起义而告诫中

〔1〕 参见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页。

〔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5—59页。

〔3〕 转引自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7页。

〔4〕 参见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编：《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第一辑（下册），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版，第1003页。

〔5〕 商务印书馆编译：《法兰西史》，商务印书馆1903年版，第44页。